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

甘 宇[1]，胡小平[2]

（1.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南岸 400067；
2.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成都 610074）

摘 要：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指导下，对三峡库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进行研究，分析了可能对其生计策略转换产生影响的生计资本要素，发现家庭年总收入、合适的创业场地正向显著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生计策略的转换。进一步分组讨论后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曾经担任村干部这两个因素均正向显著影响库腹地区组、低海拔地区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成功转换。与之相反，上述组别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受到外出务工时长和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这两个变量的显著负向影响。另外，创业初投资金的规模和地区交通变量显著正向影响库尾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

关键词： 可持续生计；农民工返乡创业；生计资本要素；生计策略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9)05－0070－13

三峡库区与我国其他大部分农村地区不同，人口密集，自我发展能力差，生态环境脆弱，不但对行业准入有着较高的标准，而且为了避免无序开发导致水土流失影响三峡大坝的正常运行，对涉农创业的操作也有严格的要求，库区的业态受到诸多限制。因此库区经济的自我发展、优化能力受到很大的掣制。同时，三峡工程的修建使得周边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地质灾害不时发生，造成土地等生产资料流失。受以上两个因素影响，库区居民的生计资本日益匮乏，缩减了该地区居民在生计策略选择范围，对库区居民的生计水平形成冲击。库区返乡农民工作为库区居民重要组成部分，其生计策略的转换同样受着库区生态环境的约束。随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政策的出台，和库区各级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三峡库区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动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但是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转换，既有主观因素主导，也有客观因素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生计策略并不一定随着其创业选择而实现自动转换。相反，相当一部分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后，仍然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收入，维持家庭的基本支出。而另外一部分农民工甚至创业失败，不得不重新外出务工，或重新选择务农以维持家庭生计。

本研究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指导下，设计调查问卷并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探究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资本组合与生计策略转换间的关系，旨在甄别制约库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能力的提高进而实现生计方式的改进和优化，从而真正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目标提供理论参考。

一、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生计（livelihood）是指一个家庭拥有若干资源（包括自身能力、有形和无形的资本）的前提下，

收稿日期： 2019－04－23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9.05.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7XJY009）

作者简介： 甘 宇（1982—），男，广西横县人，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E-mail：87534573@qq.com

为获得维持家庭人口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而采取的行动[1],生计策略(livelihoods strategies)则是指出于改善家庭经济的目的,人们追求尽可能高的回报的生计产出,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及资产进行配置、使用和经营的组合选择[2]。随着对农户生计和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逐步认识,有学者在生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概念[3],指的是在人们基于其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在所处的市场、政策、自然等多因素组成的综合风险性环境中,所采用的生计方式,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环境友好型的、缓解贫困的建设性工具[4]。在诸多提出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的机构中,影响最为深远的[5]是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所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6](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SLF)。该框架细化了脆弱性环境中政策、组织等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农户的资产禀赋为基础,探讨生计策略的选择,而农户则在此类环境中努力实现家庭的生计目标,该框架可以向单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以及因此受到约束条件提供科学的分析方法[7]。该可持续生计框架将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与禀赋划归为五类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包括家庭劳动力规模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存量;社会资本,家庭实施生计策略所能支配的的社会资源,包括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等;金融资本,包括家庭所能用于支持生产活动的现金以及可获得的借贷资源;自然资本,一般指的是自然资源,主要为土地、水和具体的生态系统等;物质资本,除却自然资本以外用于生产的物质性材料,如基础设施、生产工具、相关的耐用品等[8]。

国内外学者以农户的生计资本为框架核心,对农户生计资本与贫困脆弱性、生计资本与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及实证研究,并认为一般情况而言,那些占有相对较多资本的人通常选择面更广,并且他们对外部机会的发现表现得更为敏锐,在处理突发问题以及应对外部冲击方面具有着更强的能力,从而保障其自身的生计安全和合理地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9];而占有资本相对较少的人们往往囿于替代资本的不足,相对缺乏应对生态环境约束的缓冲能力,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造成冲击和压力[10]。三峡库区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三峡库区中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是三峡库区中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之一,他们所选择的生计策略关乎库区生态环境的改善[9]。而创业本质上是面向机会价值开发的资源获取、组合与利用过程[11],资源禀赋缺乏以及较差的资源获取能力是导致创业者失败的原因之一[12]。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家庭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能增强其机会信心,有助于提升其生计策略的转换率。比如,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其在创业准备阶段能够做出合理的决策[13];而社会资本是推进创业实践的关键动力,是创业者获取创业实践中关键资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其不仅为创业实践构筑充裕的资源基础,甚至为创业者带来资源、信息与情感支持[14]。这意味着生计资本作为返乡农民工选择生计策略的基础条件,在其创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5]。显而易见,返乡农民工所拥有的资本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并帮助我们找寻对环境保护进行政策干预的切入点[4]。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以及返乡农民工所占有的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的讨论较为全面,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对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改善和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方面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类似于三峡库区等贫困且生态脆弱的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在进行创业等家庭生计改善活动过程中,不仅受到自身禀赋的制约,同时还面临外部生态环境的硬约束,这与其他地区有着较大的区别。在他们有限的生计资本中,哪些因素影响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目前鲜有研究。农民工既具有农民的职业特征,又兼有产业工人的职业属性,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指导深入讨论和分析返乡创业农民工生计问题,不仅拓展了农村家庭生计问题研究的内涵,同时也利于更好描述宏观政策环境与返乡农民工个体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联系,是对当前研究返乡农民工生计选择相关成果的有益补充。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界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为2017年7-8月在三峡库区开展的实地走访及调查所获得。在调查中课题组主要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PRA)获取信息。调查的样本对象包括至少有一年以上创业经历的返乡农民工,其中大部分样本对象当前正处于创业当中,其余部分的样本对象则由于各种原因暂时停止创业。本次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500份,其中1163份问卷被成功收回。剔除关键信息反馈不全的问卷,最终纳入本研究分析范畴的问卷合计878份,问卷有效率达75.49%。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家庭生计策略,以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作为代理变量;(2)人力资本情况,包括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受教育情况(x1)、家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x2)、外出务工的年限(x3)、以及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x4)等;(3)社会资本情况,包括是否曾担任村干部(x5)、是否有近亲属从政或经商(x6)、家庭周边是否有创业成功的人(x7)等;(4)金融资本情况,包括农民工家庭的年收入(x8)、创业初次投入资金(x9)、信贷机会如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x10)、非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x11)等;(5)自然资本情况,包括返乡农民工创业所需场地(x12)以及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x13)等;(6)物质资本情况,包括地区交通(x14)、用电(x15)的便利程度等。

表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mean	sd	min	p50	max
y	生计策略转换	0.86	0.35	0	1	1
x1	受教育程度	2.37	0.93	1	2	4
x2	家庭劳动力人口	2.42	0.91	0	2	8
x3	外出务工时长	7.72	5.41	1	6	31
x4	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	2.27	0.89	1	3	3
x5	是否曾担任村干部	0.09	0.29	0	0	1
x6	近亲属从政或经商	2.06	0.75	1	2	3
x7	周边有创业的人	2.30	0.7	1	2	3
x8	家庭年总收入	22.83	29.13	1	14	200
x9	初投资金规模	3.95	1.23	1	4	7
x10	融资难易程度(正规融资渠道)	2.46	0.95	1	2	5
x11	融资难易程度(非正规融资渠道)	2.76	0.92	1	3	5
x12	是否有合适的创业场地	1.61	0.68	1	1	3
x13	家庭所占有的平整耕地规模	3.30	0.99	1	3	5
x14	本地交通状况	2.03	0.72	1	2	5
x15	本地用电状况	1.86	0.61	1	2	5

(二)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的生计策略

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的生计策略转换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基于三峡库区实现其功能性的特殊要求,样本区域内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的利用都存在诸多限制。虽然三峡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库区内返乡创业农民工对自然资本加以利用时,其首先需要符合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恢复等功能要求。这使得他们在进行种植业、养殖业和旅游业开发时受到的限制比非三峡库区返乡农民工多,从而难以充分挖掘和使用样本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样本地区内也严格控制甚至禁止部分物质资本作用的发挥,比如区域内道路或者水利等设施的修建,必须

符合相关要求并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大型机械、化肥、农药等物资在库区内的使用也受到严格管控。正是由于物质资本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本地区的优势自然资源开发受限,导致三峡库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生计资本难以实现有效积累,整个样本区域在教育、就业、资本支持、医疗等方面在较长一段时间以来长期处于后发地位。总而言之,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三峡库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在积累和利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时受库区功能限制的直接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因此其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过程所受到的制约与其他地区有着较大的区别。

1. 生计策略的类型

除了主观方面的因素,通常情况下人们在选择其生计策略时,主要是结合自身的生计结构特征,以及考虑其生计资本数量等因素,由此来获得对应的生计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对生计策略进行进一步优化。结合到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三峡库区的实际,该区域内正在创业或曾有创业经历的农民工家庭的生计策略大致可划分为务农为主型、务工为主型和创业型 3 种,各自特点如下:

(1)务农为主型的生计策略。该类型生计策略主要以农业的零散种植养殖为主,本研究将传统的以务农为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的普通返乡农民工家庭作为本类型的样本对象,而将实现规模农业种植养殖归类到创业型生计策略。但囿于库区生态环境维持功能的要求,该区域的返乡农民工在实施规模农业种植养殖时受到较强的制约。

(2)务工为主型生计策略。该类型的生计策略主要通过务工实现家庭生计,一般有在本地务工和在外地务工两种情形。在本研究的样本中,选择这类生计策略的主要以创业失败的返乡农民工为主,另外有一些返乡农民工虽然正在实施创业,但他们的家庭仍需要通过务工方式获得收入实现家庭的收支平衡。

(3)创业型生计策略。主要以从事工商业的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具体而言,主要为工业生产、商品经营、餐饮、旅游以及规模化种植养殖等。

在三峡库区内,上述几种生计策略均有返乡农民工从事。虽然在实际中有返乡农民工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了不止一种生计策略类型,比如有的返乡农民工在种植农作物的同时,开办了农家乐餐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以其提供的实际主要收入来源作为归类的依据。

2. 生计策略转换的界定

本研究主要是讨论生计资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生计策略转换的影响。因此,从研究的目的出发,在创业前后,无论返乡农民工选择的是务农为主型生计策略,还是务工为主型生计策略,在生计策略上,其对原始的单纯体力劳动都有着较强的依赖,尚未实现自身禀赋与外部资源的有机结合,也即没有实现以创业作为家庭的主要的生计策略。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返乡农民工选择的务农为主型生计策略和务工为主型生计策略统一赋值为 0,而将创业型生计策略赋值为 1。

(三)生计资本的量化指标

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参考和借鉴目前已有的生计资本量化分析的文献[16-18],结合三峡库区特有的生态环境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及三峡库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特征进一步调整了指标体系,使得调整后的测量指标及指标量化数值更加适合于三峡库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的情况(如表 1)。本研究所用指标主要采用三峡库区返乡创业农民工评价的方式获取。

1. 人力资本指标

人力资本指标指的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为了生活和发展所需、其实施生计策略过程中必须拥有的劳动力人口以及对应的劳动力质量,包括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水平以及劳动能力等。具体在本研究中,考虑到三峡库区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及接受创业培训可能对其创业的启动及

后续经营有重要影响作用,我们除了主要核算上述因素外,还考察了其外出务工经历、接受过的创业培训两个变量。因此,我们在本指标中纳入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受教育情况(x1)、家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x2)、外出务工的年限(x3)以及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x4)等变量。

2. 社会资本指标

社会资本是指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为了生活和发展所需,在其实施生计策略过程中可以加以利用社会资源的数量及质量。在三峡库区的农村社会中,返乡创业农民工是否曾为村干部、家庭重要外部关系从政或经商,能够直接影响家庭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在资源获得、信用评估,以及对家庭生计策略的变化方面均可能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而针对本研究所讨论的话题,在类似的生产环境和资源获得可能性下,周边是否有创业的人对家庭的创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和影响作用,可以在创业遭遇市场风险时,获得较好的指导和支持。因此,在社会资本指标中,我们纳入了是否曾担任村干部(x5)、近亲属从政或经商(x6)、周边有创业成功的人(x7)等3个变量。

3. 金融资本指标

金融资本在生计资本语境下,是指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为了生活和发展所需,其实施生计策略过程中可以调配的资金。主要包括家庭年收入、可获得的贷款等。贷款渠道既有金融机构例如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也包括非金融机构例如亲戚朋友借款筹的资金。本文采如下指标: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的年收入(x8)、初投资金规模(x9)、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x10)、非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x11)来衡量金融资本。本研究主要着眼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二者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但是由于调研所得截面数据的局限性,而返乡创业农民工采取生计策略具有滞后性,当期家庭年收入水平可能并不会影响家庭对生计策略的选择,甚至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将滞后一期的家庭年收入纳入模型,综合评价当期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

4. 自然资本指标

自然资本指的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为了生活和发展所需,在实施生计策略过程中,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中所蕴含有价值的资本,即是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存量和环境服务。在三峡库区中,由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具体行业不同,如果单纯使用一般的自然资源进行分析,所获得的回归结果可能与分析的目标产生偏差。同时受制于三峡库区的功能性要求,三峡库区内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首要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由此三峡库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不可能对区内自然资源无顾忌的滥加利用。具体到本研究中,考虑到三峡库区的实际情况,创业对场地的诉求是刚性的,因此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引入返乡农民工创业所需场地(x12)、以及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x13)等变量来测量自然资本。

5. 物质资本指标

物质资本在本研究中指的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为了生活和发展所需,在其实施生计策略过程中,所使用到的除自然资源以外的物质,主要包含基础生产资料和公共基础设施两大类。由于创业方向和行业存在差别,因此在生产资料上难以进行比较。但是,地区基础设施对于该区域所有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效益有重要影响,在三峡库区内的各个区域之间,基础设施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地区交通(x14)、用电(x15)的便利程度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刻画。

(四)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表2呈现了本研究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普遍较低,最大值为0.513。因此可以认为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本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基本不构成冲击。

表 2　相关性分析

	y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y	1															
x1	0.046	1														
x2	0.108***	−0.016	1													
x3	−0.089***	−0.333***	0.040	1												
x4	0.064*	0.091***	0.041	0.016	1											
x5	0.087***	−0.057*	0.050	−0.012	0.093***	1										
x6	0.106***	0.115***	0.059*	−0.093***	0.107***	0.062*	1									
x7	0.102***	0.096***	−0.020	−0.069**	0.116***	0.055	0.327***	1								
x8	0.191***	0.071**	0.038	−0.059*	0.039	−0.058*	0.199***	0.082**	1							
x9	0.175***	0.206***	0.059*	−0.015	0.191***	0.044	0.215***	0.202***	0.320***	1						
x10	0.055	0.095***	0.050	−0.031	0.113***	0.059*	0.069**	0.047	0.049	0.084**	1					
x11	0.078**	0.030	0.129***	−0.072**	0.046	0.047	0.200***	0.045	0.105***	0.085**	0.373***	1				
x12	0.248***	0.004	0.058*	−0.025	0.135***	0.105***	0.082**	0.033	0.112***	0.101***	0.074**	0.160***	1			
x13	−0.047	0.045	0.015	0.002	0.017	−0.036	0.027	0.054	0.060*	−0.013	−0.059*	−0.043	0.030	1		
x14	0.049	0.100***	−0.007	−0.013	−0.013	−0.064*	0.032	0.088***	0.065*	0.112***	0.061*	0.006	−0.005	0.091***	1	
x15	0.004	0.066*	−0.045	−0.009	−0.055	−0.126***	0.028	0.070**	0.078**	0.050	0.039	0.004	0.019	0.068**	0.513***	1

注:$^{*}P<0.1$,$^{**}P<0.05$,$^{***}P<0.01$,下同。

三、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

为研究生计资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本文通过二元 Probit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了清晰、简明地估算生计资本变化引起的生计策略发生转变的概率,将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简化为 0~1 型因变量 y_i,即"以创业收入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定义为 1,"以务工收入或务农收入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定义为 0;x_1,x_2,…,x_5 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拥有的五种生计资本,共有 n 组观测数据,即 x_{i1},x_{i2},…,x_{i5}(i=1,2,…,n)。假定 x_i 是自变量,P_i 是 y_i 事件发生的概率,相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P_i = Exp(\beta_0 + \beta_1 x_{i1} + \cdots + \beta_n x_{in}) / (1 + Exp(\beta_0 + \beta_1 x_{i1} + \cdots + \beta_n x_{in})) \quad (1)$$

式中,β_0 为常数,β_1,β_2,…,β_n 为回归系数,代表了各因素 x_{in} 对 P_i 的贡献度。回归系数值符号为正,表示解释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值,会相应增加发生比;反言之,对于负的回归系数,则代表每增加一个单位值的解释变量,会使得发生比相应减少。

(二)影响生计策略转换的生计资本

1.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转换的逐步回归

从表 3 中可以发现:首先,人力资本指标中的家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x2)在模型(1)-(5)中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显然,家庭劳动力人口规模越大,创业成功的发生概率越高,这与朱明芬[19]的发现一致。在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家庭劳动力规模越大,在创业选择中可获得优势,占据先机。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该指标中,样本对象外出务工的时长(x3)则在模型(1)-(5)中显著反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长越长,一方面对务工收入依赖性越强,家庭生计策略转换的机会成本越高。另一方面,务工时间越长,更趋于被动返乡创业,与主动返乡创业相比较,竞争力趋弱,难以实现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在模型(1)中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x4)在

10%的显著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但是随着社会资本等指标的进入,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x4)对家庭生计策略转换的影响力被削弱,不再显著。这意味着在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过程中,社会资本等因子的影响力比接受过创业培训这一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表3 Probit模型下的逐步回归结果

	(1)	(2)	(3)	(4)	(5)
x1	0.024	0.020	-0.038	-0.012	-0.014
	(0.40)	(0.32)	(-0.55)	(-0.17)	(-0.19)
x2	0.207***	0.195***	0.153**	0.168**	0.166**
	(3.24)	(3.00)	(2.17)	(2.25)	(2.23)
x3	-0.024**	-0.021**	-0.019*	-0.021*	-0.021*
	(-2.43)	(-2.08)	(-1.77)	(-1.89)	(-1.90)
x4	0.121*	0.087	0.051	0.014	0.014
	(1.94)	(1.36)	(0.73)	(0.19)	(0.19)
x5		0.515**	0.635**	0.586**	0.567**
		(2.13)	(2.43)	(2.07)	(1.99)
x6		0.130*	-0.004	-0.010	-0.010
		(1.68)	(-0.04)	(-0.11)	(-0.11)
x7		0.152*	0.119	0.172*	0.171*
		(1.86)	(1.35)	(1.87)	(1.86)
x8			0.042***	0.046***	0.046***
			(6.03)	(6.20)	(6.14)
x9			0.091*	0.070	0.066
			(1.75)	(1.29)	(1.22)
x10			0.040	0.022	0.017
			(0.58)	(0.31)	(0.24)
x11			0.026	-0.044	-0.044
			(0.38)	(-0.62)	(-0.61)
x12				0.483***	0.488***
				(5.90)	(5.94)
x13				-0.212***	-0.214***
				(-3.37)	(-3.37)
x14					0.088
					(0.92)
x15					-0.106
					(-0.88)
_cons	0.521**	-0.044	-0.545	-0.898**	-0.778
	(2.04)	(-0.14)	(-1.41)	(-2.00)	(-1.27)
N	878	878	878	878	878
Pseudo R^2	0.031	0.052	0.159	0.221	0.222

其次,在社会资本指标中,是否曾担任村干部(x5)在模型(1)-(5)中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近亲属从政或经商(x6)则在模型(1)中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周边有创业成功的人(x7)则除了在模型(3)中不显著之外,均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这表明,社会资本"能促进或有助于个体间或组织间的行动,并进而创造价值的各种关系"[20]。对返

乡创业的农民工而言,其掌握的社会资本在其创业过程中可以发挥实质性作用,例如提供资源和帮助[21],从而较大的促进其创业活动,显著提高创业效益和创业成功概率。尤其在中国注重关系的大环境下,社会资本在发现创业机会和获得创业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第三,在金融资本指标中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的年收入(x8)在模型(1)-(5)中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他们的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显而易见,相对于务农收入,创业收入的稳定性更强,其对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影响力更大。虽然本研究使用的是 probit 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只能证明自变量和因变量间之间显著关联,并不代表二者互为因果关系[22]。诚然,这样的结果或许可以解读为:由于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所以其更倾向于选择创业作为生计策略,也或许是由于选择了创业作为生计策略而获得了较好的收入水平。但我们难以否认的是高收入水平与生计策略之间的转换具有显著相关关系。Meng[23]就在其研究中曾指出,在农民工群体当中,创业所带来的收入最令人满意。初投资金规模(x9)在模型(3)中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初投资金规模的规模直接决定着创业收益的水平,因此其对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具有显著的影响。由于我国农村金融长期发展滞后,无论是正规信贷渠道还是非正规信贷渠道,返乡创业农民工均难以获得有效的融资,因此在本研究中,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x10)和非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x11)在各个模型中均没有显现出显著性。

第四,在自然资本指标中,返乡农民工创业所需场地(x12)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他们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与此相反,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x13)在 1% 的显著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这是因为开展创业活动首先需要一定规模的创业场地,这是创业过程中的必备要素。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如果场地诉求无法满足,则创业活动无从谈起。因此其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在农村地区的经营活动中,务农收入是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机会成本。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越大,家庭可以从务农活动获得高收入的概率越高,其进行创业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相应地其通过创业实现生计策略转换的动力就越小。因此,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对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最后,在物质资本指标中,地区交通(x14)和用电(x15)状况均没有呈现出显著影响。这个是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因为在创业活动中,区域交通越发达,物流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同样,地区基本能源如水电等保障越好,对创业活动的稳定有序进行越有利。这是创业活动能够持续进行的基本要求。因此,这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

2. 空间差异视角下的家庭生计策略转换

三峡库区各区域之间,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还是区域资源禀赋,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直接影响着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效率,引致影响其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因此,本研究从区位差异、高程差异两方面进行分组讨论,从立体的空间视角分析上述因素对不同区域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的影响。

(1)区位差异视角

在三峡库区内部由于自然区位条件、区域产业结构和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的差异性,导致库区内部经济发展也有较大差异。库尾地区基础设施较为齐备,产业结构和市场环境较好,该区域的创业条件相对于库腹地区和库首地区而言,面临的阻力较小。在产业结构上,库尾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低,第三产业发达,远高于库首地区和库腹地区;库腹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三峡库区内部区域经济条件的差异,引致返乡创业农民工生计资本占有和生计策略转换上存在差异。由于库尾地区与库腹地区约占三峡库区总面积的 85%,且均位于重庆市境

内,在管理体制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几乎一致,为了比较上的方便,本研究着重对库尾地区与库腹地区进行了比较。

表4 不同区位的家庭禀赋对生计策略转换的影响

	(1)	(2)	(3)
	全样本	库尾地区	库腹地区
x1	-0.014	-0.146	0.021
	(-0.19)	(-0.98)	(0.23)
x2	0.166**	0.028	0.225**
	(2.23)	(0.19)	(2.40)
x3	-0.021*	-0.033	-0.025**
	(-1.90)	(-1.10)	(-2.02)
x4	0.014	0.303	-0.069
	(0.19)	(1.64)	(-0.84)
x5	0.567**	0.000	0.389
	(1.99)	(0.00)	(1.31)
x6	-0.010	-0.299	0.025
	(-0.11)	(-1.53)	(0.23)
x7	0.171*	0.008	0.194*
	(1.86)	(0.04)	(1.76)
x8	0.046***	0.040**	0.052***
	(6.14)	(2.42)	(5.61)
x9	0.066	0.298**	0.011
	(1.22)	(2.14)	(0.18)
x10	0.017	-0.151	0.099
	(0.24)	(-0.92)	(1.16)
x11	-0.044	-0.062	-0.062
	(-0.61)	(-0.36)	(-0.76)
x12	0.488***	0.569***	0.503***
	(5.94)	(3.01)	(5.17)
x13	-0.214***	-0.170	-0.217***
	(-3.37)	(-1.07)	(-2.92)
x14	0.088	0.458*	0.059
	(0.92)	(1.87)	(0.54)
x15	-0.106	0.216	-0.199
	(-0.88)	(0.67)	(-1.47)
_cons	-0.778	-3.091**	-0.406
	(-1.27)	(-1.98)	(-0.58)
N	878	170	692
Pseudo R^2	0.222	0.255	0.240

从表4中可以发现,在库腹地区家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x2)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而在库尾地区没有显现出显著性。这是因为,库腹地区的劳动力处于净流出状态,很大部分的劳动力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一样,外出到城市及沿海等发达地区务工,留在农村中的劳动力很少。因此,家庭中的劳动力对家庭创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库尾地区由于处于大城市周边,家庭劳动力回流的可能性和便利性都比库腹地区强。此外,在库尾地区,家庭劳动力不足的缺口也可以通过在供给充足的劳动力市场中招募进行补充。因此库尾地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对其生计策略的转换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库腹地区由于返乡创业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年限(x3)显著负向影响其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相对于库尾地区较好的经济环境和基础而言,库腹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条件都较差,农民工返乡创业更多地依赖原有的社会资本等外部资源。但农村中的社会资本需要经常性来往进行维护,一旦其在外务工时间较长,其原有的社会资本的将出现流失。因此库腹地区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时间越长对其返乡创业越不利,从而影响其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

周边有创业成功的人(x7)这一变量在库腹地区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这表明,相对于经济环境较好的库尾地区,处于不利区位的库腹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时,其可以模仿的对象很少,周边创业成功的人可以成为他们较好的模仿和信息交流对象。因此,该变量在库腹地区对农民工创业成功及创业效益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农民工家庭的年收入(x8)在库尾地区和库腹地区中,都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没有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初投资金规模(x9)在库尾地区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初投资金规模的规模直接决定着创业收益的水平,因此其对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具有显著的影响。如上所言,库尾地区的经济环境较好,基础设施较为齐备,相同的初投资金规模在库尾地区可能比库腹地区更快地实现效益,因此其对该区域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具有显著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创业所需场地(x12)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库尾地区和库腹地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而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x13)在 1% 的显著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库腹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这是因为,相对库尾地区而言,库腹地区的农民工所能选择的生计策略非常有限,途径及渠道单一,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越大,其进行创业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相应地通过创业实现生计策略转换的动力就越小,越难以通过创业实现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

地区交通(x14)在库尾地区正向显著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本研究认为,在接近特大城市的库尾地区,相对于库腹地区来说,交通便利、物流成本低是该区域的特点。一旦该区域中的家庭生计受制于交通因素,与同区域的其他家庭相比,生计策略的转换必然受阻。因此该区域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对交通的依赖显现出显著的表征。

(2)高程差异视角

三峡库区山高谷深,海拔的高低不仅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异,同时也意味着土地资源利用规制上存在差异。一方面海拔越高的地区交通及通讯设施相对较差,因而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身的生计资本作用发挥受阻;另一方面,由于三峡库区特殊的地形地貌结构,其高程对库区土地利用方式以及使用方向具有决定作用,进而有可能影响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效益和潜力。

从表 5 中可以发现,在低海拔地区中家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x2)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而在高海拔地区没有显现出显著性。这是因为,三峡库区的低海拔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家庭成年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能够通过区位优势呈几何级别放大,从而促进其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而高海拔地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则由于所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难以发挥家庭成年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对创业的影响。

低海拔地区中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年限(x3)显著负向影响其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相对于高海拔地区较差的经济环境和基础而言,低海拔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条件都较好。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长越久,越疏于打理其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而不利于其在创业活动中的竞争,使其家庭生计策略转换困难。

表5 不同高程的家庭禀赋对生计策略转换的影响

	(1)	(2)	(3)
	总样本	海拔低于1000米地区	海拔高于1000米地区
x1	-0.014	0.013	-0.019
	(-0.19)	(0.16)	(-0.09)
x2	0.166**	0.174**	0.159
	(2.23)	(1.98)	(0.95)
x3	-0.021*	-0.026**	0.022
	(-1.90)	(-1.99)	(0.82)
x4	0.014	0.028	-0.064
	(0.19)	(0.33)	(-0.35)
x5	0.567**	0.696**	0.307
	(1.99)	(2.03)	(0.44)
x6	-0.010	0.017	-0.127
	(-0.11)	(0.16)	(-0.56)
x7	0.171*	0.140	0.381
	(1.86)	(1.34)	(1.54)
x8	0.046***	0.039***	0.125***
	(6.14)	(4.89)	(3.44)
x9	0.066	0.069	-0.023
	(1.22)	(1.09)	(-0.18)
x10	0.017	-0.031	0.270
	(0.24)	(-0.38)	(1.25)
x11	-0.044	-0.067	0.086
	(-0.61)	(-0.81)	(0.48)
x12	0.488***	0.535***	0.426**
	(5.94)	(5.69)	(2.08)
x13	-0.214***	-0.327***	0.211
	(-3.37)	(-4.37)	(1.34)
x14	0.088	0.161	-0.243
	(0.92)	(1.45)	(-0.85)
x15	-0.106	-0.195	0.034
	(-0.88)	(-1.35)	(0.12)
_cons	-0.778	-0.303	-2.811
	(-1.27)	(-0.44)	(-1.59)
N	878	670	208
Pseudo R^2	0.222	0.238	0.334

是否曾担任村干部(x5)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低海拔地区创业的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这是因为低海拔地区农民工的创业预期中,返乡创业农民工有担任村干部的经历,这种农村社会中的强社会网络必然增强创业的成功率,从而正向促进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

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的年收入(x8)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所需场地(x12)在高海拔地区和低海拔地区中,都显著正向影响他们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没有显现出明显的差异。

而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x13)在1%的显著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低海拔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显然,相对高海拔地区而言,库区中低海拔地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可支配的平整耕地生产效率更高,可种植的经济作物更多,经济作物的可替代性更强,对家庭经济的支持更有力。因此,可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越大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实现自身生计策

略转换的概率更小。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家庭年总收入(x8)和有合适的创业场地(x12)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生计策略的转换。即使进行不同分组,也没有发现其显著性有所降低。这意味着这两个变量对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具有决定性作用。家庭的收入水平对创业投资的大小有着制约作用;有合适的创业场所则是创业的必要前提之一,其能够提高创业的效率从而促进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

第二,家庭劳动力数量(x2)、曾经担任村干部(x5)这两个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正向影响库腹地区组、低海拔地区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成功转换。但与之相反的是,外出务工时长(x3)和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x13)这两个变量则不同程度负向显著影响库腹地区组、低海拔地区组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家庭劳动力规模能够充分说明家庭在创业过程中所能够调动的人力资源数量。显然,家庭中的劳动力规模越大,在其创业时所能选择的空间就越大。社会资本作为在社会网络中可以动员的社会资源,可以为创业活动提供情感、信息和资源上的支持,增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的转换概率;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其原有社会资本越容易流失,不利于创业。家庭所能支配的平整耕地规模则可能放大了创业的机会成本,使其家庭生计策略难以转换。

第三,创业初投资金规模的规模(x9)和地区交通变量(x14)分别在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库尾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生计策略的转换。库尾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在相同情况条件下,初投资金规模规模越大,其竞争力可能越强;而且处于交通发达的库尾地区,如果同地区内交通状况存在差异,则可能导致创业效果也随之出现差异,交通发达的地区更容易实现生计策略的转换。

结合上述分析结论,本研究建议:首先,从土地、税收、财政方面提高政策的有效供给力度,结合行政区域特点实现差异化政策供给,降低返乡农民工自身禀赋特别是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引致的创业效率差异。其次,结合本地区交通设施建设的区域实际,灵活安排返乡农民工创业场地,设置返乡创业园区,有计划地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产业集中,提高产业集约化,降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物流成本。最后,设置返乡农民工创业征信保障基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采取多种联合担保模式,缓解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融资约束,稳步助力返乡农民工扩大创业规模,增强其市场灵活性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AMARTYA SEN. Editorial:Human capital and human capability[J]. World Development,1997(12):1959 - 1961.

[2]蒙吉军,艾木入拉,刘洋,等. 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2):321 - 328.

[3]ELLIS F. 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4]ASHLEY C,CARNEY 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lessons from early experience [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K,1999.

[5]KRANTZ L.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An Introduction[R]. Sida division for policy & socio - economic analysis,2001(2):13 - 17.

[6]DIF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

[7]宋璐,李树茁.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 人口研究,2017(3):65 - 75.

[8]SCOONES I. Livelihood persp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9(1):297 - 303.

[9]徐定德,张继飞,刘邵权,等. 西南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9):118-126.
[10]EIJA SOINI. Land use change patterns and livelihood dynamics on the slopes of Mt. Kilimanjaro,Tanzania[J]. Agricultural Systems,2005(3):306-323.
[11]SHANE S A. The illusions of entrepreneurship:The costly myths that entrepreneurs,investors,and policy makers live by[M].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12]FOLMER H , DUTTA S , OUD H . Determinants of rural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of farmers in west Bengal: A structural equations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10(4):367-396.
[13]邹芳芳,黄洁.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2014(4):80-88.
[14]秦剑,张玉利. 社会资本对创业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效应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2013(2):96-106.
[15]FLORIN J,LUBATKIN M,SCHULZE W. A social capital model of high-growth ventur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3(3):374-384.
[16]JIGGINS J. How poor women earn income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what works against them[J]. World Development,1989(7):953-963.
[17]SHARP K. Measuring destitution: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R]. IDS Working Paper,2003.
[18]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 中国农村经济,2007(4):32-39.
[19]朱明芬. 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杭州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10(3):25-34
[20]MICHAEL A. , HITT HO-UK LEE,EMRE YUCEL.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apital to the manage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relational networks among asian and western firm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2(2-3):353-372.
[21]解蕴慧,张一弛,高萌萌. 谁会成为创业者? ——主动性人格及社会资本对创业意愿的影响[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2):148-156.
[22]冯建喜,汤爽爽,杨振山. 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2016(1):148-162.
[23]MENG X.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a Chinese case study[J]. Asian Economic Journal,2001(1):71-89.

Livelihood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 Families

GAN Yu[1],HU Xiao-ping[2]
(1.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Upper Yangtze Economy*,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Center for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Abstract: Under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elements of living capital effecting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 families. We found that annual family income,appropriate business site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Further grouped discussion found that number of family workforce and whether used to be village cadr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bdominal Area Group and Low Altitude Group, they had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in livelihood strategy. On the contrary,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abov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time of migrant work and scale of family farm land. In addition,the amount of initial investment and the regional traffic system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livelihood capital elements; livelihood strategy